

会员通讯

2015 年第 7 期

(总第 51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5 年 7 月 31 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 首届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在重庆隆重召开 (2)
-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在“第 21 届兰洽会开幕式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4)
- 国经中心举办兰州“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 (6)
- 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全球 CEO 代表团 (7)
- 国经中心举办第 72-73 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8)

权威言论

- 张晓强：“一带一路”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11)
- 郑新立：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
- 魏建国：新常态的内涵远超所有专家的解释 (30)
- 陈文玲：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的体制机制 (33)

成果摘要 (39)

国际交流 (41)

[工作动态]

首届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重庆隆重召开

2015年5月27日至28日，首届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在重庆隆重召开。此次对话会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联合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对话会以“创新引领行动，推进亚欧互联互通”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分组研讨。对话会受到亚欧大陆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密切关注，来自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政府官员、企业领袖、智库代表、各国驻华使节等300余人出席会议。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见与会的部分嘉宾，并在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并主持开幕

式。柬埔寨副首相尹财利、斯洛伐克副总理卡日米尔、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蒙古工业部长额尔登巴特、马耳他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米兹等亚欧政要、前政要代表发表精彩演讲，新加坡工商联合会主席张松声、卢森堡 SES 公司副总裁德豪尔等工商领袖代表也到会发表演讲。卢森堡首相贝泰尔通过视频表达对这次会议的诚挚致辞。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到会致辞。

张高丽副总理认为，亚欧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搭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张高丽表示，举办这次产业对话会就是广开言路、广纳良策，推进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造福各国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认为，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亚欧互联互通中的作用，围绕打造亚欧经济合作升级版，进一步完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加快推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的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建立亚欧自贸区；简化贸易通关、检验检疫、人员往来签证等手续，加快达成边境口岸开放、跨境运输等多双边政府协议，支持跨境电子商务、边境贸易等多种贸易方式健康发展；推动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的务实衔接；推动人文和社会领域的经验共享和紧密合作，并倡议召开亚欧文明交流论坛，充分发挥智库在推动亚欧互联互通合作中的作用，着力构建亚欧智库合作网络，筹建智库研究基金，搭建产学研合作的“二轨”规划

平台，促进亚欧产、学、研广泛合作。

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认为，推动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够成为拉动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供给能力。

这次会议邀请了来自 20 多位亚欧会议成员国及国际组织的政要、前政要、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列席发言，主要对“以重点领域合作提升区域联通水平”、“推进互联互通中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创新”、“互联网+”、“打造各界共同参与合作的新格局”和“探索亚欧互联互通未来发展之路”等议题进行了开放式讨论，社会反响热烈。

此次对话会成果丰硕，意义非凡。作为亚欧首脑会议的重要延伸支撑，对话会进一步促进了亚欧会议成员国之间的深度交流，并就推进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合作达成共识，收获了各国的珍贵友谊和部分早期成果。

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在“第 21 届兰洽会开幕式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7 月 7 日上午，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出席在兰州举办的“第 21 届兰洽会开幕式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张大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同时出席。

张晓强在讲话中结合国经中心的研究成果，全面重点地介绍了

“一带一路”倡议，指出当前全球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大量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紧迫严峻，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是各国共同的愿望。“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的理念和形式，致力于和平发展及携手应对全球重大挑战，以实现共同需要。该倡议在经济和资源方面促进沿线各国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文化方面有助于加强沿线各国不同文明交流与和谐共处，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

张晓强表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利益共同体、合作发展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建设，关键在于“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要推进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形成共赢新格局，要融铸沿线国家文化交流新模式，加强安全合作。

张晓强强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各个国家在各领域、各方面深化共识，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共同行动，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愿景。

张晓强并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为该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国经中心举办兰州“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

7月7日下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兰州共同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此次论坛以“抢抓建设‘一带一路’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主题。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出席。甘肃省副省长李荣灿在开幕式上致辞。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主持会议并做总结发言。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袁占亭分别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政策解读。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金融、电子商务、旅游文化等三个主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言献策。

张大卫在总结致辞中高度肯定甘肃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所拥有的良好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基础和优势，并引用“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句，表示相信甘肃省一定会牢牢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加速发展，再创新的辉煌。国经中心愿继续与甘肃省加强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甘肃省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20多个省市区政府、甘肃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州、外国驻华使领馆和国际组织及商会、境内外企业以及智库研究机构共约200位代表与会。

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全球 CEO 代表团

5月14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在国经中心会见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De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tephen Ubl 带领的医疗器械企业全球 CEO 代表团一行。双方主要就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美国在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在华发展所遇到的挑战以及中国健康城市的构建和发展进程进行了交流。国经咨询公司韩易虎总经理、中心交流部部长许朝友、产业规划部副部长陈伟博士、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全球战略分析部执行副总裁 Ralph Ives 和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中国总代表焦玲等参加。

魏建国副理事长首先介绍了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现状，表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老年化人口不断增长，而医疗服务设施却不足。中国正加快推进城市化，而最关键的一条是医疗服务。目前中国农村广大地区在医疗技术设施和医疗服务方面仍存在欠缺。希望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抓住机遇，在中国大力发展医疗设备和产业战略布局。魏副理事长并对协会未来在华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表示国经中心愿与协会加强合作，通过举办研讨会、展会及合作开发研究课题等形式，帮助协会在华发展。

Stephen Ubl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介绍了协会基本情况，表示将继续加大在华发展，但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在产品评审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愿与国经中心加强交流与合作。魏副理事长就此提出了具

体建议，表示国经中心愿从中提供协助，帮助解决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中国城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韩易虎总经理和陈伟副部长分别介绍了帮助德国医疗设备企业与中国有关地方开展合作和中国有关健康城规划发展情况，表示愿与协会共同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国经中心举办第 72 期经济每月谈

2015 年 6 月 19 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 72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分别发表演讲。

金灿荣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复杂，未来新旧问题并存。中美关系比较开放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美是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是你存我亡的状态，需要互相包容；二是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大国，具有明确的价值观，有很强的包容性；三是中美两国人民都爱好和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很深的民意基础。因此，中美两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是有希望的。袁鹏表示，中美两国关系至少发生了四大变化，第一是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正快速拉近与美国经济及军事差距；第二是两国对亚太战略态势的转

变，中国正扩大在亚太的影响，而美国在亚太影响开始减弱；第三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已发生变化，原有促进中美两国合作的全球性问题正在弱化，而合作的新基础尚不清晰；第四中美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变化。陈文玲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外交、军事、文化、政治是变量。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彼此需要合作，合作的利益大于抗衡。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解决认识上的差异，她认为要从“共存、共享、共治、共赢、共进、共建”六个方面推进。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 73 期经济每月谈

2015 年 7 月 22 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 73 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主持，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任海平、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王天龙和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分别发表演讲。

任海平从“一二三四五”五个方面对变动频繁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分析。“一”是一个主题：变，即国际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各

方面都在加速变革。“二”是两大趋势，一是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二是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发生变化。“三”代表三大热点地区，分别是乌克兰，中东和亚太地区；“四”是对世界变革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四组国际关系，即中美，中俄，美俄，以及欧美关系；“五”是对中国的五个启示，即在引领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地运筹好大国关系，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搞好周边关系，更加积极地参与世界上各种多边活动、增强话语权。王天龙分析了国际经济形势和当前应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各有难处，新兴经济体动荡加剧；未来应关注五大问题和趋势：债务危机，美联储加息，各国央行政策分化，美欧联手制定经济新规则，以及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刘向东分析了中国经济形势，他表示，上半年的GDP增长没有被高估，中国经济筑底企稳迹象已很明显。如果稳增长政策实施到位，下半年经济还会进一步回升向好。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一带一路”是适应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回溯往昔，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的友好故事。如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在世界经济交流中从容铺展。不仅是政策、贸易、货币、道路、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更可以繁荣中国和周边国家及辐射范围内国家的经济发展，着眼于创建一路繁荣，带来一片光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告诉光明网记者，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将紧密相连。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

为深入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与光明网联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推出《新常态·光明论》大型系列网络访谈节目。《新常态·光明论》第二期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晓强做客光明网演播厅，为网友阐述“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迎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一带一路”战略既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国国内转方式、调结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我国国内的区域发展来看，过去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而今在根据新的发展形势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又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我国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上，“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调发展密切相关，它恰恰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举措。

张晓强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主要内容着眼于在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大环境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加强政策沟通、贸易流通、资金融通还强调民心相通。这些体现了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方面是促进自身开放水平提高的同时抓住沿途各国的共同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共商、共享、共建”

如今说起“一带一路”似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但这其中却充斥着不少误读。不能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们首先面临的第一风险。有人说“一带一路”就是要保证中国的资源能源

供给，更有甚者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张晓强表示，这些观点都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读。

美国 1948 年正式推出“马歇尔计划”一直持续到 1952 年，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 130 亿美元。张晓强说，“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导向非常明显，通过给予援助的方式让这些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最终形成一个美体系下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前苏联阵营对抗。

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条件非常苛刻，必须减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不能搞国有化等。而“一带一路”的本质是“共商、共享、共建”，是各国共同建立的多元主体。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世界的和平、稳定、进步、繁荣，非常强调不针对于第三方，它是一种开放式合作形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共同发展，相互借鉴。

“一带一路”是顺应时代发展新潮流

那么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搞“一带一路”？张晓强表示，首先，“一带一路”顺应时代发展新潮流，能够实现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发展繁荣的共同需要，为沿线占全球 60% 多的低收入人口创造发展机遇，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

其次，“一带一路”开辟了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沿线是国际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区域之一。恐怖主义为民众

带来威胁，战乱使民众深受其害，希望能有和谐和平环境。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主要架构，以及在经济文化合作同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的构想，为“一带一路”战略畅想实现搭建了桥梁。这个构想顺应了沿线人民共同愿望，提供了有效途径，得到了各方面积极反应。

“一带一路”首先要“五通”

目前亚洲多国的交通不连不通或通而不畅，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大障碍。张晓强认为，推进“一带一路”首先在于“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促进“五通”就必须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巴基斯坦电力严重紧缺，卡拉奇、拉合尔等中心城市有时一天只能供电8小时。又如泰国、印度等国的铁路设施老旧、技术水平低，运行速度仅每小时50公里。所以加强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交通关键通道和重点工程，铁路、公路及物流枢纽建设是优先领域。

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高达8200亿美元，但是他们自身仅能提供4000亿美元，缺口巨大。

中国有能力搞“一带一路”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地积极响应，张晓强认为中国有能力搞“一带一路”至少有五大优势：

第一：中国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大量的发达国家坚持和平共处、互助共赢，这样就形成了具有比较广泛地亲和力和感召力的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好形象。

第二：目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又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特点，着眼于优势互补。目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应该说有非常强的互补性。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确实是抓住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沿线国家共同的需要，很多国家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复苏情况不好、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它也亟需通过国际合作来破解其资源瓶颈。

第四：“一带一路”得民心，我国和沿线国家双边关系是很好的。

第五：中国本身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现在经济上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我国综合国力在多个领域逐步提升，不论是基础设施、金融、制造业，乃至科技研发等都在日益提升。

所以把这五个方面综合到一起，应该说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挥积极作用，确实有自身的优势条件。

“一带一路”要发挥企业的决定性作用

最终版规划“一带一路”重点圈定了 18 个省，好像沾上了“一带一路”就能快速赚钱，“一带一路”里没被点名的省份做什么？

张晓强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或者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举措。“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涵义就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参与到的，不是说不在“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的18个省份之外的省份就没份。

实际上“一带一路”是个很开放的概念，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更不仅仅是沿线65个国家的企业，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欢迎欧美企业、全世界的企业都能参与进来，实现共赢、共谋、共建、共享。

对于企业来说，“一带一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呢？除了政府创造好环境，企业自身的行动也非常重要。张晓强认为，企业要根据不同企业间的差异错位发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上，避免雷同化发展导致过度竞争、产能过剩。

此外，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不同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抱团走出去方为上策。而企业在走出去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遵纪守法、保护环境，这样企业的发展才可持续的。

“一带一路”百姓如何受益？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一带一路”将带来哪些生活改变？张晓强介绍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实际上是体现“转

方式、调结构、新常态”的重大举措，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惠及民生。

“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包含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道路联通、民心相通。而其带来的设施互通、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融更是将为相关区域旅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基础设施联通”将极大改善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的中西部地区交通条件，改变人们出行的方式，“即时可达”也不再遥不可及，坐着高铁去欧洲将成为可能，中国邮轮旅游正式进入了“免签时代”。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展开，沿线各国也将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民众的签证手续，加上更加便捷的国际交通运输，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化、个性化旅游线路被开发，实现“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

“贸易畅通”从降低关税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一带一路”带来贸易方式的改变将更加适应当今的全球价值链时代。中韩自贸区率先突破为“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提供样本，两国零关税产品将超过九成，中韩 FTA 生效后 20 年内，韩国将取消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商品 92% 的关税，中国将消除对韩国产品 91% 的进口关税，这将丰富国内老百姓的消费选择。

过去考虑产业布局，各国各自为营而“一带一路”着眼于区域内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上的广地域立体化合作网络，使得产

业布局更合理。张晓强表示，“一带一路”带来最直接的机遇是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实实在在提高百姓的收入。

(来源:2015年7月14日,光明网-经济频道)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我国正处在实现百年强国路的前期，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既使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又使我们充满信心，我们要把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新机遇。

为深入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与光明网联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推出《新常态·光明论》大型系列网络访谈节目。邀请知名经济专家、企业经营人员和广大网民，用权威理论、生动故事、鲜活语言，深入分析中国经济，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全面研判未来走势，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首期《新常态·光明论》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做客光明网演播厅，为网友释疑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新机遇。

如果对新常态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速度降低”，那么无疑是在用旧思维看新常态，忽略了经济数据中所隐藏的重要信号。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呈现不少新亮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四年超过 GDP 增长速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超过城镇居民，这两个“超过”是我国多年期盼的结构调整的重大成果。

改革正当其时。郑新立认为，新常态也带来三大机遇。如何用好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融资改革；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和行政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带来的新机遇至关重要。“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这样一个状态才是新常态。郑新立表示，如果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达一万两千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用一百年的时间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贫穷旧中国代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光明网：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新常态？

郑新立：新常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三年前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做出的一个概括。

我们所说的新常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括的新金融显然有着不同含义。我理解的新常态应当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出现的各种特征的一个新概括，主要含义为“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

增速适度：保持7%左右；**结构优化：**第二、三产业的结构不断优化由原来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过渡；**效益提高：**财政收入、企业利润能持续不断增长；**民生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包括公共服务的水平能够不断提高；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才叫新常态。再概括一句话，就是经济增长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进入了新常态。

新常态三个亮点

光明网：新常态有哪些新亮点？

郑新立：过去一年，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呈现不少新亮点，比较突出的有三个。

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8%，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0.6 个百分点。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6.8% 和 9.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0.06 个百分点。收入分配上的这两个“超过”，带来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这是多年期盼的结构调整的重大成果。

二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及其占 GDP 的比重均超过第二产业。由此带来新增就业人数的较快增长，城镇新增就业 1322 万人，成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

三是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2%，技术创新成果开始成批涌现。我国在国内申请的技术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企业已成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加快，有力地带动了产业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的新亮点充分说明，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努力，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明显成效。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不断做大新亮点，取得转方式、调结构的决定性胜利，就能向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实迈进。

新常态三大机遇

光明网：新常态有哪些新机遇？

郑新立：宏观经济政策和投融资改革带来新机遇。《报告》关于财政货币政策的部署，将创造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其中放宽金融准入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不仅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投资体制改革及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将有力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激发经济活力。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带来新机遇。从 30 多年的改革历程看，几乎每一次经济大发展都来自农村改革的新突破。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将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潜力和新增城镇人口的巨大需求潜力，这将成为未来十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再次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村发展潜力，正当其时。

行政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带来新机遇。企业是财富的创造者，企业数量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政府减少审批、简化企业开办手续、提高小微企业税收起征点、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等改革措施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强大支持。

同时国企改革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现在，民营企业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的 2/3 以上。国企和大学技术创新的潜力还有待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深化国企改革由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企业活力；对民营企业来说，这将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和发展空间。各类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从而创造新的生产力。

“新常态不是一个筐 什么都往里装”

光明网： 对经济新常态的判断和理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基调，关系我国经济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势。因此，形成对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十分必要。今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的区间，结构在优化，但是也要关注到一些区域的变化对经济转型带来的变化。您之前说过“不能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怎样理解这句话？

郑新立： 有一段时间我们把新常态泛化了，把什么都往里装。我觉得特别是不能够把一些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趋势性问题如需求不足、经济下行、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

经济下行压力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并非无药可解。从内部看,它源于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前进的爬坡阶段。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把经济下行压力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生产能力快速扩张而居民支付需求相对下降。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扩大内需淘汰落后产能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使广大居民分享更多发展成果。

通货紧缩不是新常态。一来我们并没有陷入通货紧缩；二来通货紧缩属于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很大运作空间，完全可以避免出现通缩局面。

我国 2022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光明网：未来 10 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能否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呢？

郑新立：人均 GDP 一万两千美元是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2014 年我国人均 GDP 是 7500 美元，如果每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7% 左右，根据我的计算，2022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一万两千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上所有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的共同的特点是城乡居民收入大体拉平，凡是落实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诸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由于土地高度兼并，

失地的农民并变成城市的贫民成为城市毒瘤，这些国家即使人均GDP勉强达到一千两万美元其实也看不见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光明网：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郑新立：从30多年的改革历程看，几乎每一次经济大发展都来自农村改革的新突破。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够缩小最关键就是看农民能不能够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改革，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发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发展，承载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决定》关于土地制度的三项改革，耕地、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基地经营建设用地的改革可以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送给中国农民的三个大红包。

《决定》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比如允许承包地抵押担保转让而且承包地实行三权分立。所有权给村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搞活，这样农户凭借承包权转让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户不种地可以收地租，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发展多种经营增加一份收入。

还比如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跟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也就是说城市郊区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像国有土地一样平等的进入市场，这也为农民增加一笔收入。

这三个大红包好多都没有落实，如果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大规模展开新农村建设，使农业现代化释放农村劳动力、土地潜力，把农民工市民化，那么到 2022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缩小，这样我国就能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简政放权释放四大红利

光明网：简政放权是新常态的亮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多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537 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具体来说，这主要包括，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 76%；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85% 改为后置审批等等。您认为取得了哪些新的突破，对于企业和百姓有哪些利好？

郑新立：简政放权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政府下放审批权限对企业、对个人都是福音。

简政放权释放就业的潜力。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 36%，而在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比重是 60%，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平均是 50%。通过下放审批权限激发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使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发

展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再提高 14 个百分点，那么相当于可以增加 1 亿 1000 万个就业岗位。

简政放权释放资本潜力。我国目前广义货币存量 M2 近 116 万亿，银行的外汇储备近 4 万亿美元。这么多钱存在银行但企业仍然融资难融资成本过高。这就是政府干预过多，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还存在诸多障碍所造成的结果。那么通过下放权限，金融改革将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么大的资本存量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简政放权释放土地潜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对承包地，宅基地，都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可以与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得到落实，就意味着 6 亿多农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能够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缩小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所以下放审批权限，激发经济活力至少有这四大潜力，四大红利可以释放出来。

钢铁和石化这两大材料行业由于实行不同的政府审批的政策，导致现在出现两个不同结果。钢铁行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充分竞争，所以即便钢铁现在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但我国钢铁产能产量仍占世界的 50% 稳居第一，每年出口上亿美元，百姓也能从钢铁价格下跌中受益。相反由于我国对化工行业实行严格国家审批制度，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化工行业供给严重短缺，缺乏国际竞争力。现在每进口石油化工产品四千亿美元。这次国务院下放审批权限，未

来将陆续会有更多好消息传来，随着民营资本的进入，石油化工产品的价格、成品油的价格也必然会下降。

引进互联网思维 传统行业仍大有作为

光明网：“什么互联网+、什么大数据、什么工业 4.0，都顶不住传统行业一铲子”。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却很有意思的道出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作为新兴产业的互联网非常强大几乎无所不能，大有取代传统产业之势，近年由于互联网的极速渗透一些传统行业出现业绩颓败之势。那么在互联网的夹击下传统行业是否还有生存空间呢？

郑新立：传统产业在中国虽然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最大的潜力在农村。

增速下滑、库存增加、限购城市增多等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话题实为老生常谈。而限购、限行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很消极的解决办法，应该用经济的办法比如北京市正准备推行的先有停车场才可以买车，“我看这就是一种改革，可以倒逼企业增加停车场、增加道路建设”。但是更大的汽车潜力在什么地方？在农村。农村没有道路限制也不怕污染不怕噪音，如果农民收入增长起来，一个农户会买两个车，一个运货一个拉人，中国有两亿多农户这得需要多少辆车？以汽车这样的传统产业为例，表面上来看是产能过剩，实际上是没有把潜在需求释放出来。

对于石油化工行业，产能过剩疑虑难消。实际上目前我国每年石油化工产品的进口量是 4 千亿美元。4 千亿的石油化工进口量至少可以盘活二万多亿的市场空间。无论从进出口份额还是开发新产品市场，看似产能过剩的石化行业其实市场需求大得不得了。

根据我的计算，中国人均消费的支出只有美国的十二分之一，而美国的人均 GDP 是我国的五六倍。如果我国人均消费水平赶上美国的二分之一，也就是现有的人均的消费支出就要增长 6 倍，那么现有市场里的东西一下就买光了，企业没库存就会促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就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了。问题的关键是体制跟政策没有把需求潜力释放出来，未来随着简政放权庞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将被激活。

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不是自己在产生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谁很快找到互联网谁就能找到发展新机遇。目前和互联网结合最好的是金融和零售业。这给中国的制造业和农业指明了方向，比如陕西雁北一个贫困县通过互联网平台改良了品质和销售渠道，一斤胡萝卜由五毛卖到五元，一根小小的胡萝卜带来一个村脱贫，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郑新立表示，如何利用互联网把产品销到全世界是各个领域尤其是传统行业所要努力的方向。

城乡居民收入和环保是“十三五”的目标

光明网：中国经济从“十二五”迎来新常态，今年是“十二五”最后一年。各界对“十三五”的规划充满新的期待，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位“十三五”？“十三五”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

郑新立：“十三五”最大的一个事就是实现全面小康。“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最关键的是经济增长要均衡，城乡差距要缩小。

第二个硬指标就是环境污染指标。“十二五”环境污染的指标就没有实现。所以“十三五”的两个硬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和环保指标一定要实现，这也是“十三五”的难点所在。

（来源：2015年6月29日，光明网-经济频道）

新常态的内涵远超所有专家的解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魏建国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并在此后多次阐述“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面“减速换挡”，更重要的是，新常态反映在我们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创新等一系列的方面。“它的领域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专家们所讲的只局限于GDP的一个数字变化”。

日前，在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与光明网联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推出的《新常态·光明论》大型系列网络访谈现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表示：“新常态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有专家的这些解释”。

这个常态，前面加一个“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魏建国表示，常态是中国的文化，是中国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过程中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不是各级官员以GDP为标准，不是一些企业家以追逐市场利益急功近利为标准，也不是一些科研人员，以抄袭、抄近路、追求学术名义为标准。这个常态，是我们以后一个很长时间内党带着人民向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新标志。魏建国表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把握点：1.“静能生慧”、2.“定能生慧”。凡事不要着急，不要被GDP一两个点干扰，更不受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小动作和媒体一些挑拨言论所激怒，要有布局的定力。掌握这个定力是我们的新常态。历史讲究的是关键时刻考验大国智慧，“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的观点，我认为习主席讲的新常态已经超过了其他专家解释的所有内涵，这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也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智慧”。

其次，这个“新”，魏建国认为，就是要对所有的事件，包括科技、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历史、科技都要有一个新的全球战略眼光。在今后的世界里，如何从一个利益共同体打造成命运共同体，再从命运共同体打造成责任共同体。是要从全球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命运出发考虑的一件负有责任的大事，要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任何线来划敌我，也不是我们跟任何一个经济体采取零和的、

博弈的，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博弈的方式，而是各国要采取一个合作、共赢、互利、包容、开放的新态度，新模式，新途径。这就是新常态，核心含义、它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有专家的这些解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责任比以前更重了，我们要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活动包括新常态下的活动，是在国际层面上各国走一条和平、共赢、共享、共建的路子。

中国要面对大国地位的新常态。魏建国认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下一步发展起来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好处，“在面对周边国家的问题上，我们也要新常态”。

古语云：“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利享用，利享用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网相连”，魏建国指出，通过高铁、中国互联网的走出去我们要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搭乘中国这个便车对周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国家不清楚，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对这样的情况要直面，不要担心也不要焦虑，通过 FTI 战略、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实际合作项目，这些国家的人民、人心是会能够理解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所以在魏建国看来，新常态就是要做到心相通，这样各国一起都顺利、一顺百顺。

（来源：2015 年 7 月 17 日，光明网-经济频道）

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的体制机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智库，是助推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智囊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保持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和大道行思的智慧谋略，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对我国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今天，我国智库不仅要苦练内功、自我提升，还应该放眼世界，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与博弈的体制机制，真正让中国智库在世界上发出声音，引起关注。

1.我国智库存在的阶段性缺陷

我国智库正在蓬勃兴起，但整体现状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尚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七个缺乏”。

缺乏清晰的智库定位。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中国新型高端智库的定位应该是：着眼于实现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军事强国和外交强国的百年梦想，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整体战略和正确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从总体上看，我国按照这一定位规划自身发展的智库并不多，能够提供具有影响力、震撼力的思想产品的智库更是明显不足。很多国际一流智库往往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主，而我国正缺乏这类能在国家战略、国家决策和国家政策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智库。与此同时，我国的第三方独立智库也有待发展。

缺乏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智库议题或方案。我国相当一部分智库自主提出议题和方案的能力比较薄弱，提出的议题往往缺乏足够

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或者限于对已有的政策、观点做出诠释，难以形成高水平的“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议题质量不高，就会导致智库缺乏独立的、内容鲜明的、有预见的、足以影响决策的观点。同时，较之于政界、学界，我国智库缺少语言特色和有个性的表达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库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缺乏新型智库的运营模式和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一些智库部门化色彩、行政化色彩、官本位色彩浓重，一些体制机制问题约束了思想产品的创造和创新。智库存在作风机关化、分配平均化、运行低效化等问题。全社会的智库研究资源较多地呈现出分割化和碎片化，跨领域、一体化、协同化进行战略设计的体制尚未形成，整体设计能力较弱。还有些智库在尝试进行跨领域战略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政府对研究成果的包容度不够等等。

缺乏跨领域、跨区域、跨国界研究的合作研究体制机制。从地方层面来说，为各地方服务的地方智库，往往本土化色彩明显，地域意识过于浓厚，难以进行跨区域研究；从部门层面来说，智库的部门所有制对智库研究有所限制，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水平和结论的科学性；从国家层面来说，跨国界合作研究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仍存在审批手续烦琐、具体限制过细等较多问题。

缺乏可以与国际一流智库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对话平台。随着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壮大，中国正在拥有国际话语权、主导国际性议题的路上稳步迈进。然而，总体看来

全国智库还缺少此类具有引导力、影响力的对话平台。在国际性论坛中，一些中国智库专家的发言往往流于概念、模棱两可，这样的表达方式，很难在国际对话博弈中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

缺乏一流的智库人才。是否能够吸引和运用好优秀人才，对智库建设至关重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0 多位研究人员中，1/2 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其他也多是各领域顶尖研究人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研究人员，智库成为政府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基地。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年过九旬还奔走于国际社会，70 岁以上的约翰·桑顿、伯格斯滕等智库领军人物，都还活跃在世界思想界的前沿。相比较而言，我国智库队伍存在学术化、经院化、部门化、年轻化等弊端，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缺乏新型智库筹资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公共政策的制度尚不完善，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智库缺乏资金来源。在发达国家，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主的智库，其主要经费来自政府购买。目前，我国很多智库和科研机构都存在类似问题——在课题经费使用上，智库或被按照国家机构对待，或被按照企业对待，都只能发放少量用于智力劳动的劳务费，其余则必须走报销途径。如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就无法体现智力劳动的价值，也不利于智库的造血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2.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

中国智库要想真正壮大，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必须深化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抓紧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抓紧建立智库参与国家决策和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机制。要让智库发挥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作用，就应让其了解国家需求，给其更多了解决策、参与决策的机会。当前，我国智库对国家战略制定的参与度较低，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也缺乏制度化设计。应加快培育一批与政府既有密切关联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方社会智库，为其提供与体制内智库平等的研究条件和竞争平台，并尽快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设立政府公共服务采购基金，专项用于对社会智库提供支持。

抓紧建立符合现代高端智库规律和要求的组织形式与运营机制。要创新智库的组织管理方式和运营机制。在人才吸纳、运用、流转，成果发布和应用，科研管理体制，经费使用办法等方面，可借鉴国际一流智库中一些符合中国智库实际需要的模式，抓紧进行改革探索。在此过程中，可采取集成创新的方式，在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新，这样更容易构建新型而又科学的智库管理体系。建议中央明确一个部门，对此进行整体设计。

抓紧建立适应国际一流智库要求的人才机制。要想建立可持续的研究管理、人员管理与激励制度，就应坚持人才的多样性、开放

性和竞争性。国际一流智库的人才来源一般是：卸任官员、企业界精英、知名学者和专家、著名智库人才。这启示我们：首先，我国智库对具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学术背景的高端人才应突破年龄限制，把其作为现阶段高端智库的领军人物；其次，要抓紧培育结构合理的智库研究队伍和运营团队；最后，对智库研究人员，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不应参照公务员规定进行出国管理限制，应根据研究需要和交流需要，允许一年内多次出国或免予审批。

抓紧建立国际通行的智库管理制度和筹资机制。国外智库大多实行预算制，60%以上的课题经费用于人力资本支出，因为智库产品靠人创造，研究投入就应主要用于人，用于思想产品的支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务管理制度，智库就无法真正成为高质量思想产品的制造者。建议选择一些高端民间智库作试点，率先建立符合智库特点的财务管理制度。还应抓紧进行智库筹资机制改革，与企业和个人捐助制度结合，适当减免相关税收，调动社会资本支持智库建设的积极性。

抓紧建立成果转化应用和鼓励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制。应抓紧建立国家决策者定期对智库提出研究方向的制度，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议题，引导智库把政府采纳意见和建议作为衡量自身影响力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在国际交流方面，智库观点可以更鲜明，据理力争的能力应该更强。尤其是在国际论坛上，智库不应

怕争论，应该根据自己的过硬研究，为维护中国的权益立言、立功、立德，敢于做公信力强、性格鲜明的大国智库学者。

抓紧建立智库协同创新机制。智库研究中，往往涉及一些国家总体战略和时间、领域跨度较大的战略，单靠一家或几家智库，很难具备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的一揽子方案设计能力。应抓紧建立各类智库协同推进、协同创新机制，比如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确定对沿线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的国内智库分工，将战略研究深化、细化和实化。

抓紧建立提高智库软实力和影响力的支撑机制。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研究院、彼得森研究所、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德国的贝塔斯曼基金会等国际一流智库的合作交流中，我们发现，这些智库生产思想产品的自由度更大，知识储备更多，研究深度更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有持续、稳定的国家支持体系和保障体系。我国应从战略上更加重视智库建设，建立智库支撑与保障体系，提供合理而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来源： 2015 年 07 月 22 日 16 版，《光明日报》）

[成果摘要]

《研究报告》2015年第30期：改革补贴机制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

【摘要】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方式不灵活，补贴效率较低。一是按规划补贴阻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迅速扩大，二是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扩大也导致补贴规模不断扩大，资金征收压力不断增加，三是化石能源补贴对冲了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效果。建议逐步减少化石能源补贴，开征化石能源税收，平衡能源税收在生产消费各环节的分配，适度增加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研究报告》2015年第31期：我国援非农业项目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为例

【摘要】我国将对非洲的农业援助视为提升国际形象的重大举措，援助额逐年增加，援助方式更加多样。但是，援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受援国对我国的援助时有微词，原因在于实施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和感受。建议完善援助政策，在援助中更多从受援国实际需求出发，提升援非农业项目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

《研究报告》2015年第32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非常紧迫。从财税体制的角度来看，引发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包括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财政投入的城乡非均等化、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资本收入者的“隐性”补贴机制，“农村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制度的诸多问题。要“对症下药”，采取有效政策措施解决。

《研究报告》2015年第33期：区域信息技术创新政策比较研究——以北京为研究视角

【摘要】在“互联网+”、智能制造大背景下，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正面临转型期、瓶颈期和突破期，存在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学研结合程度低、市场化取向的创新生态薄弱等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对北京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国际一流的创新特区、完善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构建相容共生的创新网络、鼓励支持创业的风险投资、保护规范共享的知识产权、注重不拘一格的延揽人才、实行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培育宽容合作的创新生态等。

[国际交流]

2015年6月26-27日，曾培炎理事长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辞。魏礼群常务副理事长主持开幕式，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出席开幕式并主持欢迎晚宴，魏建国副理事长、张大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出席开幕式并主持论坛有关环节，王春正主任、聂振邦副理事长、姚中民副理事长、赵进军副理事长出席开幕式，聂振邦副理事长、赵进军副理事长并在综合论坛发言。中心各部门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

2015年6月27日，曾培炎理事长出席中心分别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澳经济关系展望》、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及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两机构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中心签约，张大卫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参加。交流部和信息部参加。

2015年6月8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出席美国保尔森基金会举办的“强化市场机制，改善空气质量”招待酒会和“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招待晚宴”。交流部陪同。

2015年6月27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特蕾莎·里贝拉，探讨双方开展合作事宜。张永军副总经济师、经济研究部和交流部陪同。

2015年6月10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商谈两机构开展合作事宜。交流部陪同。

2015年6月27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金农及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一行，探讨举办中新伙

伴关系论坛有关事宜。张永军副总经济师和交流部陪同。

2015年6月5日，陈文玲总经济师会见美国商务部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西德哈斯·穆汗达斯。战略研究部、经济研究部和交流部参加。

2015年6月1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美国波特兰发展委员会主任、执行董事派翠克·昆顿一行，商谈今年可持续城镇化市长培训事宜。

2015年6月3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商谈美国环保协会主席福瑞德·克虏伯出席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有关安排及双方合作事宜。

2015年6月4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美国商会大中华区执行主任王杰，商谈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时间和议题。

2015年6月8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平燮，探讨两机构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期间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5年6月9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家明一行，深入交流我中心和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合作情况。

2015年6月10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新西兰使馆一秘梅丽莎，商讨9月合办第二届中新伙伴关系论坛事宜。

2015年6月15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办公室主任爱德华·戈登伯格，探讨未来合作事宜。

2015年6月17日，交流部参加波兰外长来华举办的波兰-中国

商务论坛对接会，并协调部分会员企业与会。

2015年6月27日，交流部负责人许朝友会见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秘书长派特·英格利，商谈9月第二届中新伙伴关系论坛事宜。

2015年6月16日，国经中心经济研究部徐洪才部长、交流部许朝友部长会见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汉斯·皮特·朗克斯（Hans Peter Lankes）先生，为了该行行长苏玛·沙克拉巴蒂（Sir Suma Chakrabarti）本月底出席我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作铺垫，并探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机会以及与亚投行的合作机会。

2015年7月3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中心会见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经济二等秘书温大为（David Warner）、高级研究与项目官员李连庆。中心经济研究部张焕波、交流部刘隽等在座，为中澳两国深化经贸合作关提供建议。

通讯地址：北京市永定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050

联系电话：010-83362170 传真：010-83362176

网站：www.cciee.org.cn
